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研究丛书》

现代性的本土回响：近代杨墨思潮研究

*Local Response of Modernity: A Study of
Yang Zhu and Mo-tse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何爱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资助项目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Project

现代西方本土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李泽厚文集·第五卷
李泽厚文集·第五卷

李泽厚 著



李泽厚文集·第五卷
李泽厚文集·第五卷

本书受复旦大学光华人文基金资助

现代性的本土回响：近代杨墨思潮研究

何爱国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本土回响：近代杨墨思潮研究 / 何爱国著. —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5.1

ISBN 978-7-5100-8105-7

I. ①现… II. ①何… III. ①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②杨朱（前395-前335）—哲学思想—研究③墨翟（前480～前420）—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5 ②B223.05 ③B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3463号

现代性的本土回响：近代杨墨思潮研究

责任编辑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00-8105-7/B·010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导 言	001
一、研究旨趣与方法	001
二、先秦杨墨何以能言盈天下？	002
三、秦汉以后杨墨何以会长期沉寂？	008
四、近代以来杨墨何以能够复活？	013
五、近代杨墨诠释的方法	016
第一章 杨朱学派的近代活化	020
一、杨朱学派的近代复活	021
二、杨学活化之个人与自由	025
三、杨学活化之民主与权利	027
四、杨学活化之快乐与纵欲	030
五、杨学活化之厌世与断灭	033
六、杨学活化之日常生活之道	034
七、近代杨学活化的原因	037
第二章 近代杨朱学派新形象的构建	042
一、杨朱学派的古代形象	042
二、杨朱学派的近代新形象	049
三、杨朱学派新形象塑造的原因	057
第三章 世变而学变：梁启超的杨学三变	066
一、维新时期：“最深恶痛绝其言”、“杨学遂亡中国”	067
二、新民时期：“发明杨朱之学亦足以救中国”	072
三、新文化运动时期：“希腊主义与文艺复兴的精神”	077
四、东方文化复兴运动时期：“周秦诸子都带积极精神”	082

第四章 墨翟学派的近代活化	087
一、墨学活化现象及其根源	088
二、墨学活化之科学	099
三、墨学活化之民权	102
四、墨学活化之平等、博爱与社会主义	105
五、墨学活化之社会进化论	109
六、墨学活化之功利主义	112
七、近代墨学批评：宗教、生活与政治	114
八、从对抗到调和：儒墨关系新论	117
第五章 复兴与反对：近代墨学主要流派	121
一、考据派	122
二、洋务派	124
三、维新派	128
四、革命派	133
五、新文化派	141
六、东方文化派	144
七、西化派	148
八、科学派	150
九、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派	151
十、墨学反对派	155
第六章 学以忧世：章太炎的墨学三变	161
一、“佚、翟之祸，斯亦酷矣”：1904年以前的毁墨	161
二、“其道德非孔、老所敢窥视也”：1904—1914年的彰墨	165
三、“十字军之祸，夙见于禹域矣”：1914年以后的批墨	172
四、忧时之学：章太炎墨学三变之理路	178
结 论	185
后 记	188

导 言

一、研究旨趣与方法

诸子学复兴，特别是杨墨思想复活，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历史现象。杨朱墨家思想在先秦中国曾经“言盈天下”，秦汉以后却长期沉寂，近代以来又强劲复活。^[1]为什么杨墨思想沉寂千载却仍然能够得以复活？杨墨思想复活为什么会变成近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思潮？近代国人是如何重新理解杨墨思想的？学者诠释它的主要方法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学术史的关注。如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2]。而且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墨学的复活，对杨朱学派思想的复活研究很少，更谈不上把这两个学派联系起来思考。

本书主要从思想史角度探讨先秦中国的杨朱学派思想与墨家学派思想如何在近

[1] 近代中国墨学得以强劲复活，赖有《道藏》保存《墨子》一书。杨朱之学则资料稀少，《列子·杨朱》又真伪莫辨，且篇幅太小，没有专书，故复兴受到制约。如顾实《杨朱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钱穆《中国思想史》主要依靠先秦诸子中保存的杨朱学派零星史料。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国学小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则主要依据《列子·杨朱》。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则主要依据《吕氏春秋》保存的杨朱学派史料。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则综合运用了《吕氏春秋》、《淮南子》与《列子·杨朱》。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则认为杨朱就是庄周，古音相近。当代学者刘荣贤《庄子外杂篇研究》认为《庄子》的《让王篇》为杨朱思想的反映。窃以为杨朱并非庄周，《庄子》一书中杨朱与庄周是分开的，对杨朱学说是批判继承的，批判其好辩，继承其齐物轻物重生思想，发展为养生养神逍遥思想。《列子·杨朱》应是杨朱学派的史料搜集，与先秦诸子书、《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保存的史料能够相互印证，当为可信。栾调甫《杨墨之辩》认为，《列子》一书系采集诸子成书，不能与后人凭虚臆造之伪书同论，当属正论。

[2] 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代中国复活的历史。但本书所论的思想史，并非一般的思想史，当然也不是学术的思想史与哲学的思想史，而主要是现代性的思想史与社会性的思想史。也就是说，本书主要是从现代化视角与社会思潮视角入手的。现代化的视角主要有两个：一是现代性的本土回响，即伴随西方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现代性是如何做适应中国的艰难调整的，也就是西方现代性的本土适应问题。本书讨论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博爱、平等、权利、功利、社会主义等思想是如何借助于杨墨思想得以传播的。二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化，即中国传统思想如何借助于“千年变局”与西学传入的契机实现自身的现代调整与适应，也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接续与再造问题。本书讨论了杨墨思想在近代复兴的方式问题，也就是杨墨思想的新诠释问题。社会思潮的视角，主要分析杨墨思潮与近代社会脉络的关系问题，即与近代社会的“千年变局”特质的内在理路。

本书从思潮、流派、个案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思潮方面，主要是探讨杨墨思潮复活的契机与缘由、杨墨新诠释的理论与方法。流派方面，主要对近代墨学流派的演变与得失进行了较有系统的讨论。个案方面，主要对梁启超的杨学研究及章太炎的墨学研究进行解剖。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从现代性的本土回响与本土思想的现代适应的视角对杨墨思潮的近代诠释进行深入探讨，对梁启超的杨学与章太炎的墨学研究进行具体探讨。

二、先秦杨墨何以能言盈天下？

杨朱学派与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期言盈天下，风行一时。这是确实有历史依据的。先秦史籍多有记载。《孟子》一书是对杨朱学派、墨翟学派深恶痛绝，持激烈批判态度的，称其为“禽兽”，当不会故意夸大其影响。^[1]《孟子·滕文公下》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尽心下》又言：“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可见当时儒家、墨家、杨家当为并世最有影响的三大学派。其中，杨墨似乎还超过儒家。《庄子》也把杨、墨两家视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两大辩论学派。《庄子·骈拇》言，（辩者）“杨、墨是已”。《庄子·胠篋》提出“钳杨、墨之口”。《庄子·天地》斥责“杨、墨乃始离跂（分道

[1] 钱穆《杨朱考》认为孟子所称的杨墨“言盈天下”，对墨家学派的观察是对的，对杨朱学派的观察是误导，原因是孟子想以此贬低墨家。但通观《杨朱考》，钱穆并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参阅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259页。

扬镳），自以为得（自以为得救世之道）。”《庄子·徐无鬼》则观察到当时五大学派鼎力争鸣的社会现象：“儒、墨、杨、秉（公孙龙，字子秉）四，与夫子（惠施）为五。”《韩非子·显学》认为当时墨家还是与儒家并世的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同样，杨朱学派也仍然存在，并有较大影响。《韩非子·显学》言：“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说的当属于杨朱学派。《韩非子》推崇杨、墨为“天下之所察”的两大学派，而儒、墨则为“博习辩智”的两大学派。《韩非子·八说》言：“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又言：“博习辩智如孔、墨。”《吕氏春秋·不二》对当时流行的十大学派进行了点评，其中有“墨翟贵廉（即兼）”、“阳生（杨朱）贵己”的评论。《淮南子·俶真》对于先秦时期讲“治道”的学派代表，推举了“墨、杨、申、商”。《淮南子·汜论》还列举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墨子、杨子、孟子四大学派主张的先后对立。墨家学派的思想有专著《墨子》流传下来，杨朱学派的思想虽然没有专著，但《孟子》、《庄子》、《荀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还是保存了一些史料，留下先秦杨学活动的蛛丝马迹。由此可以推知，先秦时期，杨朱学派与墨子学派为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学派，当属无疑。

杨墨能够成为战国时期两大有影响力的学派，其故何在？学者分析多多：但多是谈诸子学兴起或百家争鸣的共同背景，单独对杨学与墨学兴起原因的分析并不多。顾实认为，“杨墨皆具有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精神，用能亘战国二百五十年间，大受天下之欢迎，而享一代之大名。”^[1]顾实的分析固然有理，但太笼统。

从思想内容看，墨学是对儒学的批判性创新，而杨学则是对墨学的批判性创新。^[2]二者看似把为私（为我，贵己）、为公（兼爱）各推向极致，但最终又是公私相通，公私合一，公私一体。杨朱学派虽然主张“全生（性）保真”，“智之所贵，存我为贵”，但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私自利，《列子·杨朱》言：“虽全生，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反对“横私天下”，连身体也认为应该

[1] 顾实：《杨朱哲学》，岳麓书社2011年版，自序第3页。

[2] 钱穆认为，道家言反朴无治，原于墨。参阅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页。

“公天下”，杨朱学派的“圣人”是《列子·杨朱》所言的“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物者”。其“至人”则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者）”。大禹就是杨朱学派身体“公天下”的典范。可见杨朱的为我并非自私自利，而是尊重个人选择、尊重生命价值的意义。而墨家的兼爱也并非不爱自己，不爱父母，墨家主张爱人就包括爱自己，无非是墨家的爱己与其他学派不一样之处在于，墨家之己是具有兼爱精神的己，而不是自私自利的己。因此，在其他学派看来，墨家似乎是不爱自己。墨家的兼爱并非孟子所说的无父，墨家认为爱自己的父母也可以从爱他人的父母开始，这叫做交互作孝子。墨家认为投桃报李是人之常情，既然如此，爱他人的父母，当然就是爱自己的父母。所以爱他人的父母，最终还是会落脚于爱自己的父母。所以《孟子》书中的墨者夷子也可以“爱无等差，施由亲始”。兼爱究竟是从自己的父母开始，还是从他人的父母开始，对于墨家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杨朱学派与墨家学派的理想政治家都是大禹。儒家持中庸之道，但大禹也是儒家的理想政治家之一。三派看似对立，实际又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一切为了济民救世。

虽然《孟子·滕文公下》对杨墨两派极力诋毁：“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视之为歪门邪说。但既然杨墨能够言盈天下，当有不可易之理存在。杨朱学派的不可易之理就是尊重个人选择，尊重生命价值，注重精神自由。这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生命如草芥、暴力为王的春秋战国时代，显得弥足珍贵。

杨朱学派高扬人文主义思想，推崇人的生命与精神价值。《列子·杨朱》言：“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也。”杨朱学派虽然认识到人的宝贵性，但又反对人对自然万物的统治，反对唯我（人类与自我）独尊，主张生命平等，生命皆可贵，生命皆有意义，具有鲜明的齐物论思想。《列子·杨朱》言：“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生命的意义在于顺应自然，全性保真。“不违自然”，“不逆万物”，不斤斤计较名誉、寿命、权势、财富、地位等等。《列子·杨朱》言：“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不逆命，何羨寿？不矜贵，何羨名？不要势，何羨位？不贪富，何羨货？此之谓顺民也”。

杨朱学派勘破生死玄关，超越人情世故，希望以平常之心看待生死之道，主张“生相怜，死相捐”。《列子·杨朱》言：“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

语至矣。相怜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饥能使饱，寒能使温，穷能使达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锦，不陈牺牲，不设明器也。”

杨朱学派也不是孟子批判的无君主义与唯我主义，而是如《列子·杨朱》所言“君臣皆安，物我兼利”。

长期以来，国人对杨朱的为我主义产生极大的误会，以为为我就是自私自利。恰恰相反，为我主义兼有“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两种取向。《列子·杨朱》言：“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伯成子高是“独善其身”的典范，而大禹是“兼济天下”的典范。所以杨朱希冀的天下治理方案是，“古之人（如伯成子高）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如大禹）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切实捍卫自己的权利），人人不利天下（坚决不损害别人的权利），天下治矣。”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权利理论的影响下，近代学者对杨朱的为我主义有了更准确的评价，《杨墨哲学》认为，“当时社会人心，与杨朱抱同一思想者正多，杨朱不过是其中最显著的。”^[1]《杨朱》认为，杨朱学说能够和儒家墨家鼎足而三，言盈天下，“正是为着他能够高张‘为我主义’的旗帜”。^[2]因此，杨朱学派能够在先秦时期风靡一时，是有深刻的学理支持的。至于其他学派对其有意或无意的误解，在学术争鸣中是完全正常的。诚如章太炎所言，战国诸子喜标新立异。从墨家非儒开始，诸子学派就不再坚持儒家的述而不作，而是主张既述又作，鼓励创新。

墨家思想能够风行天下，通常没有什么疑问。因为墨家以兼爱为中心的十大学说、“以自苦为极”的实践精神、“摩顶放踵利天下”的救世精神，在先秦就已经赫赫有名。连他的反对派也不得不予以崇高的敬意。如激烈批判墨家学派的孟子学派与庄子学派，不得不佩服墨子“利天下而为之”，“真天下之好也”。其他如荀子学派与吕不韦学派虽然均反对墨家的非乐与轻视礼节，但对墨家的“爱利”却也非常认同。据佐藤将之研究，荀子将墨家的主要价值概念，如“兼”“爱”“利”“义”等价值统合于他自己的政治社会理论之中。^[3]吕不韦学派对墨家学派的“至公去私”也是极为认同的。虽然儒家、道家、法家等对墨家的

[1] 蒋竹庄编：《杨墨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1页。

[2] 陈此生：《杨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7页。

[3] [日]佐藤将之：《荀子礼治思想的渊源与战国诸子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57页。

兼爱主张不遗余力地大肆批判，但实际上兼爱思想合乎人类的深层境界与精神升华，自有其永恒的价值和人性的光辉。即使是其反对者，也往往如《墨子·兼爱下》所言“言而非兼，择即取兼”。如孟子虽然激烈反对墨家的兼爱主张，但孟子在劝说君主实行王道仁政的时候，还是以兼爱说教。《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记载：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饿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墨子·兼爱下》述“兼士”之言：“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兼士”之行：“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发问：“今有平原广野于此，被甲婴胄，将往战，死生之权，未可识也。又有君大夫之远使于巴、越、齐、荆，往来及否未可识也。然即敢问不识将恶也？家室，奉承亲戚，提挈妻子，而寄托之，不识于兼之有是乎？于别之有是乎？”

对照这两段话，我们不难看出，孟子虽然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但他实际上对墨子所说的兼爱思想又是有所认同的。这也正是孟子对墨子的学说既恨又爱的原因所在。更何况儒家对于墨家着力推崇的大禹也是高度认同的。《孟子·离娄下》中言：“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

《墨子·兼爱下》认为，只有人人兼爱，才能实现儒家理想的德目：“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墨子·兼爱上》营造了一个充满爱心的和平乐土：“若使人人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虽然现实难以期冀，但终究是人类的伟大理想。这也是墨学的永恒意义所在。虽然钱穆在《墨子》一书里认为墨学处处充满矛盾，处处与现实唱反调，这种深刻而伟大的矛盾导致墨学蜕变，但社会本身就是充满深刻而伟大的矛盾的，墨学不过是对这种矛盾的学术反映。《墨子》正是发现了这一深刻而伟大的矛盾：人人期待他人兼爱，自己却只是希望享受他人兼爱的好处。但墨学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里，而是以“摩顶放踵”的精神，以“以自苦为极”的表率作用，率先垂范，尽最大的可能性改变这

种人性，这恰是儒家所高度推崇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伟大人格精神。钱穆《墨子》认为正是墨子那种艰苦卓绝笃实光辉的人格，使得墨学大受欢迎。^[1]

从圣王理想和人格精神看，三大显学无不推崇大禹。但儒家由于偏重孝道，主张仁民爱物应该从亲亲开始，治国平天下应该从修身齐家开始。故其更理想的人物是舜。而墨家的理想典型虽然包括儒家亦推崇的尧、舜、禹、汤、文、武，但墨家最推崇的还是大禹。因为墨家的理想政治是兼爱、节用，而大禹则是兼爱天下、以自苦为极、极其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典范。《庄子·天下》中，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当为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跣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杨朱学派的理想政治是，要么人人自尊自爱，又不妨害他人，如伯成子高；要么人人不以天下之利来为自己牟取私利，人人把自己的利益视为天下的利益，包括自己的身体也不看作属于自己的，也就是说，在为天下人服务的时候忘记了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如大禹。《列子·杨朱》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从杨墨学派推崇的典范来看，大禹无疑具有最大的感染力。这估计也是两派学说甚至比儒家还要流行的原因。因为儒家崇尚的是朴实的孝道，而杨朱学派与墨家学派则崇尚的是伟大的奉献精神。而奉献精神是更能够感动人的。杨朱学派当然还推崇伯成子高那样“独善其身”、自尊自重的隐士精神，这对普通人而言，也是极为富有吸引力的。

先秦杨墨的盛行不仅在于其学说义理的合理性，理想的感动性，也与其活动形式相关。杨墨两派的能言善辩是先秦公认的。《孟子》、《庄子》与《韩非子》均认可杨墨两派为先秦最精通辩术的学派，以致逼迫孟子不得不也随之好辩，《孟子·滕文公下》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尽心下》言：“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茆，又从而招之。”《庄子》虽然极为欣赏“无用之用”，却激烈批判杨墨两派的好辩行为，认为其属无用之言。《庄子·骈拇》言：“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

[1] 钱穆：《墨子》，载《墨子 惠施公孙龙》，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乎？而杨、墨是已。”以致《庄子·胠篋》主张“钳杨、墨之口”。《庄子》批判杨墨两派的好辩行为，主要认为其于养生求道无益。当然，《庄子》指责的好辩不仅有杨墨，还有儒家、惠施、公孙龙等。《庄子·徐无鬼》引惠施言：“今乎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当然庄子是主张齐是非的，对好辩是很反感的。《庄子·徐无鬼》言：“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惠施）为五，果孰是邪？”《韩非子》认为杨朱、墨翟乃天下著名之察士，《韩非子·八说》言：“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但认为其于治国之道却无用。“干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墨家好辩，在先秦应该是最知名的。墨家好辩是因批判儒家而起，揭开了先秦好辩的序幕。《庄子·齐物论》言“有儒墨之是非”，《庄子·列御寇》言“儒墨相与辩”。儒墨长期为显学，应该与这种不停的辩论是相关的。在长期辩论中墨家积累了丰富的辩论经验，以致有子后人所言的《辩经》，即《墨经》或《墨辩》。杨朱学派好辩，据《淮南子》推测估计主要是由批判墨家而起，而儒家的孟子则对杨墨均加以批判，荀子也大批墨家，韩非子则对杨墨均予以批判。《吕氏春秋》也批判墨家的非乐非礼。钱穆认为墨子极端反对孔子，杨朱又极端反对墨子，当时墨子学说极为流行，连带杨朱学说也极为流行。^[1]由此可知，百家争鸣之中，谁能够在辩论中赢得多数人的同情理解认同，谁的学说才有可能最受欢迎。而好辩的杨墨无疑是能够赢得多数支持的。

由此三方面推知，杨墨学说能够流行，与其义理的合理性、理想的感动性、活动方式的吸引力当为息息相关。

三、秦汉以后杨墨何以会长期沉寂？

秦汉以来杨墨何以长期不彰？这是近代杨墨学复兴之中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有人认为杨墨之学消亡了；有人认为墨学不是消亡而是转化了，先后转化为农家、名家、道家与道教；有人认为墨学被儒学吸纳融化了；有人认为墨学精神一直活跃在下层社会之中；有人认为杨学虽然不存在，但杨学精神保留在文学之中；有人认为杨学精神普遍存在于国人身上。但杨墨之学长期不显，乏人问津，确实是一个历史事实。杨朱之学，自被庄子学派吸纳之后，就不再彰显。墨家之学自战国结束之后，也不再彰显，此后汉代墨学微弱，主要是以游侠活动的形式存在。在明代以

[1]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兰台出版社1979年版，第19、20页。

前，治墨学者也只有零星几人，如东晋的鲁胜、唐代的乐壹，且没有专著存世。直到明清稍多。治考据学者，兼治墨学，以裨益儒学。

杨朱学说为什么先秦之后不彰，甚至“失传”？一般人都归结为其有自私自利与纵欲主义的思想，即杨学的义理存在问题。但陈此生指出，这只是社会上的误会。“因为社会上向来都提倡为群主义，使个人崇尚团体的尊严，牺牲自己以替团体服役。故把‘为我’的观念，看作是自私自利，罔知大体。”但其实，我们分析杨学的义理发现，杨学并非自私自利，而是一种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结合在一起的积极的个人主义思想，亦非纵欲主义，而只是一种顺应自然的自然主义。因此，杨朱学说消亡的更深刻原因，可能是统治者以为其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而不喜，更为其摧残。“当时风尚完全是一种强逼政策，什么自存，自立，自由，还有立足的余地吗？继着跑出一个专制魔鬼的秦始皇，辅之以一个趋时政客的李斯，实行那‘别黑白定专一’的政策，杨朱学说更是他们的眼中之钉，不拔不快。”老百姓信奉杨朱学说还可能招致杀身大祸。“做百姓的如果在当时讲究这派学说，岂不成了反叛！马上就要惹杀身之祸！所以向来的读书人只好顺着孟子的意思，当他是禽兽，不消提他。”^[1]但杨朱学说是否真的根绝了呢？梁启超认为墨学虽绝，杨学并不衰，其精神保存在文学之中。^[2]蔡元培更提出杨朱学说就是庄周学说，根本没有灭绝。蔡元培所说虽然难以获得学界的大多数支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庄周虽然并非杨朱，但杨朱学说的确不独保存于《列子》之中，《庄子》也保留了大量的杨朱思想，并且继承并发展了杨朱思想。其后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也继承并发展了杨朱学说，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使得杨朱学说获得了进一步的继承发展。因此，杨朱及其杨朱学派的名字尽管后来很少提及，但杨朱学说在道家学说与文学作品之中的确传承了下来。

关于墨学灭绝，或者中衰问题，一般都认为墨学衰亡于秦汉之际。主要有秦亡说与汉亡说两种。孙诒让《墨子间诂》在《墨子传略》提出“墨氏之学亡于秦季”。^[3]《墨学传授考》又提出墨学微于秦而绝于汉。“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学竟绝。”^[4]《墨学通论》提出“自汉以后，治教专一，学者咸

[1] 参阅陈此生：《杨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1—73页。

[2] 参阅梁启超：《国学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75页。

[3]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2页。

[4]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09页。

宗孔孟，而墨氏大绌”。^[1]汪中《墨子序》认为墨学微于楚汉之际，但孝武之世犹有传者，此后无闻。梁启超《国学小史》、《墨子学案》提出墨学汉代完全灭绝论，“自汉以后，墨学算是完全灭绝了。”^[2]章太炎也认为“墨学之传，绝于汉后”。^[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墨学在司马迁时代早已消灭。^[4]方授楚《墨学源流》认为墨学亡于秦汉之际。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认为，“墨子书自汉以来，已不甚显闻于世。”^[5]

关于墨学亡绝原因的探讨，主要有外因与内因两种说法。

外因论强调墨学消亡并非出于墨学义理违背人心。如孙诒让认为：“墨子立身应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轻相排竿。”^[6]墨学“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可取者盖十六七”。^[7]外因论强调儒家或统治者的反对，或者是不合大统一形势的要求。汪中主要归之于统治者的反对。“以彼勤生薄死，而务急国家之事，后之从政者固宜假正议以恶之哉！”^[8]孙诒让主要归之为儒家的反对。认为墨学亡绝原因是“蒙世大诟”。^[9]汉代“讲学家剽窃孟荀之论”，“习斥杨墨为异端，而未有读其书，深究其本者”。^[10]当然，《墨子绪闻》也承认墨学的形式的确也对墨学传播不利：“非徒以其为儒者所摒绌也，其为道瘠薄而寡泽，言之垂于世者质而不华。”^[11]张惠言则完全把墨学亡绝归之于孟子辟墨的功劳：“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自孟子之后至今千七百余年，而杨氏遂亡，墨氏书虽存，读者盖鲜。大哉，圣贤之功若此盛矣！”^[12]胡适也主要归之为儒家反对，另加上政客

[1]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6页。

[2] 梁启超：《墨子学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150页。又参阅梁启超：《国学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51页。

[3] 章太炎：《蓟汉雅言札记》，载《蓟汉三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1页。

[5] 栾调甫：《墨子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6]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3页。

[7]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页。

[8] 汪中：《墨子序》，载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73页。

[9]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09页。

[10]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36页。

[11] 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25页。

[12] 张惠言：《书墨子经说解后》，载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79页。

猜忌，末流陷入诡辩。^[1]顾实归之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杨墨学说浸微”。^[2]陈柱认为墨学之亡主要是因为不合统一后的国家要求。“其自苦既为学者所难能，而以武犯禁，又为法纲所甚恶；且其名理异同之辨，已为学术统一后所不需；器械攻守之具，尤为国家统一以后所大忌；则其学虽不微，其可得乎？”^[3]

内因论，则强调墨学衰亡主要出于墨学义理本身的问题。梁启超《国学小史》认为墨学非乐，审美观念降到零度，是墨学失败的最大原因。又认为墨学内部存在深刻的矛盾性，如尊鬼又薄葬，平等又尚同，乐利又非乐，宗教又没有来世，也是其不传之原因。^[4]章太炎认为墨学义理“其兼爱、尚同、天志之说，守城之技，经说之辨皆亡矣；而明鬼独率循勿替，汉晋后道士，皆其流也”。“贵俭非乐”“不自为”，是墨学灭绝的根源。“凡立宗教者，必以音乐庄严之具，感触人心，使之不能厌。而墨子贵俭非乐，故其教不能踰二百岁。”^[5]《原墨》认为“钜子之传，至秦汉间而斩。非其道之不逮申、韩、商、慎，惟不自为计，故距之百年而堕”。^[6]钱穆继续发挥王充、梁启超的墨学义理矛盾的说法，提出墨学因自身深刻的矛盾性不得不转化而消亡。钱穆认为墨学先后转化为许行学派（南方墨学）、惠施学派（中原墨学）、宋钘学派（中原墨学）、辩者与别墨、游侠等，继而消亡。墨学“在行为上，因为反乎人情，所以不得不变，变向思想一面去；但是他在思想的形式上，又是一个反乎人情，又是不得不变，到后来变得不成一个样子，所以人家到底说墨学消灭了”。但“墨学中间可保留的东西，他家都代他保留着”。^[7]钱穆在《中国思想史》里又认为墨学刻苦人生，却没有提供死后的天堂来做现世的补偿。^[8]方授楚认为墨学衰亡是因为墨学自身的缺点，而非外在力量。其缺点有四：自身矛盾；理想过高；组织破坏；拥秦嫌疑。最根本的原因是义理过时。“墨学本以旧贵族社会之崩溃而发生，在改革过程中其主张虽激，尚有以活动也。迨变革已

[1] 参阅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1—203页。

[2] 顾实：《杨朱哲学》，岳麓书社2011年版，自序第3页。

[3] 陈柱：《墨学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141页。

[4] 参阅梁启超：《国学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53、255页。

[5] 章太炎：《荜汉雅言札记》，载《荜汉三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页。

[6] 章太炎：《原墨》，载《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7] 钱穆：《墨子》，载《墨子 惠施公孙龙》，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8]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兰台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